

●把名字废了，
但文章却流芳于世……

●著名理论家唐弢
说：“《莫须有先生坐
飞机以后》，可以和《围城》
相媲美。”



废名小说

主编 艾以 曹度



●
安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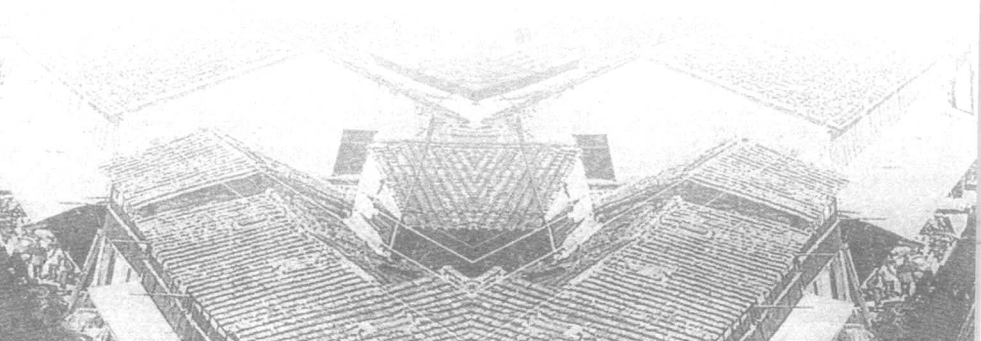
废名小说

●主 编 艾 以

曹 度

●副主编 王宗义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上 卷)

总 序	贾植芳 1
梦中彩笔创新奇	
——废名的文学生涯和小说艺术	冯健男 3
莫须有先生传	23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133

总 序

贾植芳

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就为多年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的艾以同志的那部记叙文坛逸事、衡文论艺的文艺随笔集《艺海一勺》写过序文，现在他与曹度同志结伙，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主编一套《昨日丛书》，即“将在建国后几十年间因各种原因被冷落、被遗忘的作家作品作为重点出版对象”，以便“发掘新文学的成就与全貌，便于读者拓展阅读视野，也为新文学史家提供治学与研究条件”，“为新文学作点辑佚工作，为继承与发扬新文学优良传统作些微薄的贡献”等等。作为一个多年在文苑跑龙套、打零工，又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老文艺学徒，对他们这套丛书的编辑旨趣，他们对“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的历史命运的认识与思考，我是完全同感的，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曰“英雄所见略同”。因此，当艾以约我为他们这套丛书写序时，我不顾自己年迈身弱，就慨然从命，也可以说是为艾以的编著的第二次作序，大约这就叫“一客不犯二主”；但更主要的是，上文引述过的他们这套丛书的编辑旨趣中的话说，对我又是一种新的触动，有些“白头宫女话玄宗”似的，不胜感慨万千！

我觉得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或重要的。还是在粉碎了“四人帮”，清除了为祸我国社会与文学多年的极左思潮与路线后，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历史形势下，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汇的时势下，

人们立足于自己的生存的现实与历史环境，多年麻痹的精神忽而觉醒了，在沉重的历史反思中，人们提出了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呼声。因此，将多年来被历史尘沙掩埋的作家作品，重新加以发掘、整理、印刷，正如岳飞在《满江红》词句中所说的，“从头收拾旧山河”，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真面目，这应该是我国现代文学建设的基础工程。

也因此，我不仅赞同艾以、曹度同志兴建这项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作为一个同业者，我更感谢他们的艰辛的劳动。

是为序。

1996年5月28日，上海寓所。

梦中彩笔创新奇

——废名的文学生涯和小说艺术

冯健男

废名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他在二十、三十和四十年代所出小说，早已绝版；现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重新出版废名小说原著，作为《昨日丛书》中的第一种，这在今日中国出版界和文化界是一件大好事。为了方便读者，现在就我之所知，对废名的生平和创作略述如下。

一 生 平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1901年11月9日（辛丑年九月二十九日）生。家在黄梅县城内。这里山青水秀，民情朴实，是鱼米之乡。黄梅民间文艺兴盛，是黄梅戏的发源地，这个剧种后来流传到安徽安庆一带发扬光大。黄梅又是佛教胜地，有四祖寺、五祖寺，禅宗四祖道信在黄梅传衣钵于五祖弘忍，弘忍是黄梅人，五祖传衣钵于六祖慧能，慧能是广东人，特地到黄梅来求佛法于弘忍。禅宗衣钵六传后不再下传，但其教义则传之永远。黄梅的自然山水，民情民俗，民间文艺，净土气氛，深深地影响着废名的成长和创造。

废名的祖父是竹器工人，父亲是读书人，以教书为业，叔父开布店，家中薄有田产。废名幼时在家乡私塾就读。私塾里的学习生

活给予他很坏的印象和痛苦的感受。他后来常说那是“黑暗的监狱”。在私塾里，老师并不教育儿童，只是坐在那里发号施令，叫小孩子们“读！”或者“背！”或者“回家吃饭去！”给小孩子出的作文题目则是“雍也可使南面义”之类，令小孩们糊涂和痛苦。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儿童只能自找一点自由和阳光。就幼年的废名来说，他也能自得其乐，例如他读《四书》，读到“小子鸣鼓而攻之”觉得喜悦，因为私塾设在一个庙里，庙里常常打鼓，但自己想打却是不能。读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觉得喜悦，因为私塾面对城墙，城外是河滩，是绿洲，那上面最显得有风，他读着书，其实是在那里描画风景。

废名离了私塾，在县里上了三年高小。他在1916年十五岁时离开家乡，到省城武昌去求学。先在一所中学就读，然后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一天，国文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首白话新诗，题目是《蝴蝶》，作者是胡适。这位国文教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但他写出这首新诗来并不是教学生学习 and 欣赏，而是以“不屑于”的神气借它嘲笑新诗。而废名倒是因此接触了新文学，并知道北京有胡适这个人物。在这以后，他又在《新青年》上读到周作人的新诗《小河》，觉得欢喜。从此注意读周作人的文章。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废名在武昌任小学教师，但有志于文学事业，开始与在北京的周作人通信。

1922年，废名二十一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本科英文系。这样，他就走到胡适、周作人的门下和身边了。鲁迅也在北京大学教课，而且废名对他早就有文学上的敬仰，此后也多所求教于他。

废名于1922年秋到北京后即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主要是写小说，也写新诗和散文，发表于《努力周报》、《小说月报》、《语丝》、《骆驼草》等刊物。其小说结集出版的有：《竹林的故事》（北京新潮社，1925年），《桃园》（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枣》（开明书店，1931

年),《桥》(开明书店,1932年),《莫须有先生传》(开明书店,1932年)。

废名的这些小说,有的写于北京城内,有的写于京郊之西山。1927年张作霖入北京,改北京大学为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休学,卜居于西山村舍,埋头读书著书。一年多以后,北京大学恢复开学,废名回校继续在英文系学习,至1929年毕业,后来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讲师。废名从西山回北大后,仍保留西山村舍写作地点,有时出城到这里来用功。

从1922年开始创作到1932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出版,这十年,是废名创作小说的初年和盛年;此后,他少写小说了。已出版的《桥》是上卷,此后,他写下卷只写了六章,在《新月》发表三章,在《学文》发表一章,在《文学杂志》发表二章。他所擅长的短篇小说,在1930年后没有写了。为什么在盛年之后突然衰落了?原来是他这时潜心学佛,“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周作人语),同时,他这时对写小说有怀疑,认为小说本以真实动人,但编故事、设机关,转而不真实。所以他说他现在喜欢散文而不喜欢小说。就是这样,他这时多写散文和新诗,小说几乎不写了。

1937年芦沟桥事变引发了全民抗日战争,废名于是年初冬脱离北平回到故乡黄梅避难。起先住在县城的家中,1938年夏,日军逼近,举家迁往乡下,四处逃难。1939年秋,政府在山区开办小学,废名任小学教师;次年,县中学恢复开学,废名改任中学教师。因日军时有侵扰,学校多次迁徙,仍难得安定。就是这样,废名在乡间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这时废名虽然离开了文学界,停止了文学创作;但他脱离了书斋生活,深入了民间,体察了民情,认识了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感受了中华民族的御侮精神之不可战胜。他僻处山乡,但对社会反而较以前接触较广,上至县长,下至保甲,三流九教,各色人等,都不免有所碰撞,有所认识;但相处最亲、认识最深的还是农民。所以这个时期的生活,对于废名的思想发展

变化来说是很重要的，也为此后的小说创作作了准备。

1946年，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复校，胡适出任校长，汤用彤任文学院院长，废名受聘返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7—1948这二年为时不长，却是废名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他写了一组散文，回忆儿童生活，如《散文》、《教训》、《放猖》、《打锣的故事》等，可以说是废名的“朝花夕拾”。在《散文》一文中，他把早期小说《浣衣母》“复原”了，并在文中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所以有朋友要我写小说，可谓不知我者了，虽然我心里很感激他的诚意。”话虽如此，但他还是写了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原来当时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复刊，请废名写小说，诚意可感，盛情难却，于是写了这部长篇小说在《文学杂志》上连载。这又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小说，因为它只写事实，不施想象，与作者以前的小说大不相同了。这部小说写的是废名战时在黄梅的避难和教书生活，这八年刚刚过去的非常生活也在促使废名“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可贵的是，废名毕竟是小说家，他这样写，还是写成了一部小说。

1949年全国大陆解放和新中国建立以后，废名仍在北大任教。1951年10月至1952年5月，他与北大师生去江西万安参加土地改革，曾动心写小说，但未能成为现实。

1952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废名离开北大到东北人民大学（后改称吉林大学）任教授。次年患严重眼疾，在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治疗后戴特制眼镜，不能伏案，他只好昂头托木板写文章，编讲义，按时到中文系上课，从不缺勤。1963年，废名患膀胱癌，两年后又患胃癌，1967年9月4日，废名在长春逝世。

在五十年代以后，废名的著作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其主要者有，《跟青年谈鲁迅》（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杜诗讲稿》（东北人民大学学报，1956年），《废名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杜甫的价值和杜诗的成就》(人民日报,1962年3月28日),《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冯文炳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废名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等。

二 蜕 变

废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独创性最为人所称道。这不但表现在他的创作一无依傍,独立走自己的路,开辟自己的艺术境界,而且表现在他总是不断地突破和刷新自己,追求和实现新的创造。

1926年6月,废名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个名字,起一个名字,就叫做废名。我在这四年以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就把昨天当个纪念日子罢。”^①由此可见废名之名起于何时和因何而起。所谓“蜕了不少的壳”,也就是说多有蜕变,更新。废名在《竹林的故事》序中说:“最初的三篇没有收在这集子里。本来连《讲究的信封》同《少年阮仁的失踪》我也不打算要,今天偶尔一翻阅,却不觉又为自己悲——相隔不过两年,竟漠然若此!”这是在1925年3月说的话。到了1927年5月,又是“相隔不过两年”,废名又说,“《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是我过去的生命的结晶,现在我还时常回顾他一下,简直是一个梦,我不知这梦是如何做起,我感到不可思议!”^②当时,废名正在造《桥》,他的创作,至此又有大的蜕变,“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③,就短篇小说来说,如《菱荡》,“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④。到了《莫须有先生传》,作风又大变,行文如水之流动,如风之呼号,“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故典,他不肯草率

① 《忘记了的日记》,《语丝》第一二八期,1927年4月23日出版。

② 废名:《说梦》,《语丝》第一三三期,1927年5月28日出版。

③④ 《废名小说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地使用它们，他随时随地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①。而在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之后，《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出现，又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它平实得出奇，行文如行者，自由在地走路、说话，“写的都是日常生活、风土人情，跃然纸上，比编造出来的光怪陆离的事情更有意思”。更为可贵的是，这部小说“记录了战时的社会风尚，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也和老百姓的情绪有关，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作家的感喟与讽刺，隽永深刻，值得回味。”^②

废名的这种“蜕壳”现象，当然是作家的独特艺术个性和追求所致，但仍有其社会原因。1922年废名到北京时，正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处在退潮时期。但退潮并不等于衰竭，春风仍在吹拂，曙光还在前面，而就废名来说，他本是受到文学革命的鼓舞和推动来到北京的青年，所以他这时的创作，是面对现实的（如《讲究的信封》），写回忆家乡的作品（如《浣衣母》、《竹林的故事》），也是清朗的人生图景，振荡着温馨的青春气息。尽管出于作者的性格，作品中带有淡淡的“哀愁”，但并不是“逃避现实的”^③，也是比较“闪露”^④的。他这时的创作是写实，其中多有虽然简练、然而细致的描画，“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的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⑤。由此可见废名

① 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

② 唐弢：《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文学评论》1982年第三期。

③ 周作人：《〈竹林的故事〉序》。

④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⑤ 沈从文：《论冯文炳》，《沫沫集》，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出版。

早期作品已表现不凡,但并不“隔”,人们可以“接近”和观赏。

自此以后,国事日非,黑暗日深,特别是1927年张作霖入关,李大钊遇难,国民党“清党”,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被杀,真是暗无天日。在这样的大势之下,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是严重问题。即以鲁迅、周作人、胡适这样的《新青年》阵营中人来说,至此进一步分化,政治态度、治学方向与文学观念都不同了。鲁迅向左走,胡适向右行,而周作人则是“叛徒与隐逸合一”。废名追随周作人,到这时去西山隐居,“躲起来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①了。文风至此“变得古怪”,不像以前的平实、冲淡、清朗,而时有闪跳、奇趣、晦涩。废名小说愈来愈“难懂”,但又愈来愈耐人寻味。这时的创作也写实(因为是小说),但也象征,也意象,也意识流(废名自己的,不是借用西方的),也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和古典主义的精致。

废名创作的这种蜕变,放在“五四”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来看,是特别的现象,也是必然的事情。文学在发展中总是有变化的,这在新诗的发展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由初期白话新诗到“新月派”诗,再到象征派、现代派诗,再到“火把”诗、“鼓手”诗,有其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必然。小说的情况比较复杂,但也是在发展中求变化,由浅显变丰富,由单一变多样,废名就是在这个大环境大气候中不断蜕变的。用周作人的说法,那就是:“近来创作不大讲究文章,也是新文学的一个缺陷。的确,文坛上也有做得流畅或华丽的文章的小说家,但废名君那样简练的却很不多见。”^②他又说:“庸熟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犹之乎明代的“公安派的流丽遂亦不得不继以竟陵派的奇僻”^③。这

① 《废名小说选·序》。

② 周作人:《〈桃园〉跋》。

③ 周作人:《〈枣〉和〈桥〉的序》。

样看来，废名创作变化至此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他以他的“文章之美”弥补新文学的一个“缺陷”；反过来说，又正是这一方面的“缺陷”引起和促使了废名的讲究文章，从而成就了废名。

废名创作的这种蜕变，又是中国和西洋的两种不同文化和文学在作家心头的碰撞和融合的表现和结果。废名是从学习西洋文学，受到它的影响和启迪，因而开始文学创作的。回顾以前的学做古文，弄得思想糊涂，这时可说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小鸟儿一般的歌唱；但到后来，对西洋短篇小说的写法失去了新鲜感，觉得学着那样写，也会有架子，看来还是中国的民族形式好。他所说的中国的民族形式，包括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竟成为废名小说蜕变的主要因缘。这就是废名自己后来说的，“在艺术上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一些长处，又变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诗。”^①

吸收外国文学的长处，不独废名如此，新文学作家大都如此（不过废名的“吸收”又是特别的情况）；而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以写新小说，则是废名的特创。废名这样创作，就把小说诗化了。

同时，废名拆除小说的架子，不编故事，不设机关，像中国画家那样地写意，从而在画面出现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日月星辰，这就把小说散文化了。

把小说诗化和散文化，这是废名创作的主要特点，也是这位作家为新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也正是因此，废名树立起他的风格；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文体家。

^① 《废名小说选·序》。

三 风格·文体

废名在本质上是诗人，他的早期小说就带有诗意，如《柚子》、《鹁鸪》、《竹林的故事》、《河上柳》、《桃园》等，都让人感觉到这一点，因而沈从文认为，“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出现”^①，如诗如画，情景交融的特点，在这时的小说中已有所显现。

但这并不是说废名早期小说就已是诗化的了。这时的作品大致还是一般小说的写法，故事情节虽不分明和着重，但还有个淡淡的影子在那里支起。哪怕是《桃园》这样诗意浓郁的小说，其中的人物行动和意识流动也形成了一条线，而到了《菱荡》，情景不同了，作者画给人看的不是有长度的东西，而是一个浑圆，人物风景在其中共呈异彩，“真有唐人绝句的特点”。让我们回头看唐人绝句吧，“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送别》），“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秋夕》）如此等等，都是浑圆之体，情景交融于其中，人物行动如“掩柴扉”、“闻啼鸟”、“扑流萤”、“卧看牵牛织女星”，思维活动如“王孙归不归”、“花落知多少”，并无起止，并不影响故事的发展，原来它们也都是景。其中未免各有故事，但诗人写出来的却是意境。现代小说《菱荡》竟也是这样，其中人物（陈聋子以及洗衣妇人）的行为不推进故事，却和“菱荡”一起化成诗的意境。

^① 沈从文：《论冯文炳》，上海大东书局 1934 年出版。

长篇小说《桥》集中体现了废名小说的诗化。就全书来说，《桥》是诗化了的；就每一章来说，都是诗化了的；甚至一句两句文章，也自成意境。

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地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仔细一看，这地方是多么圆，而且相信它是深的哩。越看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里的瞳人一样，他简直以为这是一口塘了……

（《芭茅》）

这时一对燕子飞过坡来，做了草的声音，要姑娘回首一回首。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垅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刀笔径斜。

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

走进柳阴，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

（《茶铺》）

（“细雨梦回鸡塞远”）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

（《塔》）

像这样美妙的笔墨，在《桥》中触目皆是，举不胜举。它是一本大画册，包罗万象，其中每一画页，又自成境界，每幅画的局部、断片，也闪耀着意象的自得和灵动。那笔墨时时在写景，又时时在写情，写人。风景是人（小林、琴子、细竹）之所见、所感、所思，而人也是风景。这里常见“天人合一”。草“吞着阳光绿”，燕子“飞来说绿”，大雨“装不满一朵花”，这本是自然（天），人的感应亦如此。

废名小说的诗境里充盈着自然和人生的美趣、情趣和意趣、理趣，这就和禅趣搭界，甚至融合。有一对联，上联是“万物静观皆自

得”，可见之于寻常百姓家。由此可见，人能“静观”，就会有得，何况诗人，更何况参禅悟道、明心见性的废名先生。而“静观”正是禅之所习和所需，其“自得”表现为“顿悟”。严羽《沧浪诗话》有云：“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桥》的静观和妙悟表明了诗道和禅道的相通。道在哪里？道无所不在。一花一叶，一鸟一石，一灯一镜，一笑一嗔，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无不能因静观默察而悟道闻道。燕子“飞来说绿”，这就是道，它的“来”和“说”之因缘在于“绿”。大雨“装不满一朵花”，这就是道，因为这是真实和真理。这样的事和理，人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之闻之可以无动于中，心有所动可以莫名其妙，但小林、琴子和细竹却由此而有美和真的发现，也就是由静观而悟道。特别是小林，他在风景中常常参悟宇宙人生，昼和夜，光明和黑暗，古和今，声和默，喜和哀，善和孽，时间和空间……时时触动启悟他于花叶摇曳之时和光风霁月之间。例如《清明》写上坟，坟之“浓淡”，“一则要经剥蚀，一则过一个春天惟有加一春之色——沧海桑田权且不管。”在这里，“剥蚀”，“加一春之色”，“沧海桑田”，都与时间有关。现在正是清明上坟，那亘古之变化只好“权且不管”，不然的话，“加一春之色”何用？小林还说，“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这是由时间转到空间了，但还是潜在那个“权且不管”。又如《桥》这一章写小林他们到八丈亭看牡丹，引起小林诵出李商隐咏牡丹诗中的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并解释道：“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小林因此又说：“记忆这东西不可思议，什么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现颜色……我的灿烂的花开之中，实有那盲人的一见。”这引起细竹“把眼睛一闭”，她说：“我的花更灿烂了。”这样的描写和意境很美，很灿烂，其实又都有人物对于宇宙人生的参悟，觉人之所未觉，发人之所不能发。妙就妙在这不是谈禅论道，而是在写诗绘画。“‘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

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①。的确，《桥》是小说艺术，是诗艺术，是“高华简练”的语言艺术。

废名自云：他的小说“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②由此可见语言的独出心裁的巧妙运用对于他的小说诗化的创造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不肯浪费语言”意味着简练，而简练是废名创作的原有特点，至此是进一步简练了；以前的小说是简练得冲淡、朴讷，而《桥》则是简练得高华、雅致。即如“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这里省去了多少文字，这样写树阴多么传神，把它的凉意全然写出了，“池塘生春草”这句古诗化用非常自然，天衣无缝。“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垅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这又是用简练、省略的语言写美丽的风景，写两位姑娘的高华的举动，天下景色出自两对明眸，明眸受燕子尾剪指引，而又“管住它”，一幅美景就是这么“笔径斜”。由此可见小说文字的省略，意象的闪跳。这样的文章不可以一目十行地读，而必须反复地咀嚼、体会，以得其美味和真谛。其实，以上举例在《桥》中还不是闪跳最甚、藏义更深的，只是略见一般罢了。废名的这种语言和笔法，既适应了诗，也适应了禅。禅主静默，不落言荃，有所言语，也多闪跳，接近于诗，反映其静观和顿悟。例如佛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金刚经》）又如六祖慧能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坛经》）这不也是诗吗？

废名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同时完成于《桥》。“五四”后习见小说的样式在这里看不见了。一章一章书就是一篇一篇美文，如诗如画。很显然，不这样散文化，也就诗化不了。

《莫须有先生传》不再是诗化的小说，虽然它仍有诗意。不过它

① 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7月出版。

② 《废名小说选·序》。